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4/52
2 February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
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

秘书长依照人权委员会第1993/64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目 录

	段 落	页 次
导 言	1 - 3	2
一、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3/64号决议收到的资料	4 - 11	2
二、联合国人权机构收到并处理的指称发生恐吓和 报复事件的资料	12 - 41	4
A. 关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 的特别报告员	13 - 31	4
B.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32	7
C. 注视危地马拉人权状况的独立专家	33	8
D. 海地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34	8
E. 注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特别代表	35	8
F. 苏丹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36 - 41	9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继续不断接到报告反映一些个人和团体因试图与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代表合作而受到恐吓和报复,另有报告说发生了一些阻止个人运用联合国主持制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保护程序的事件。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了第1993/64号决议,对上述情况再度表示关切,并敦促各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恐吓或报复行为,反对:(a) 那些试图或确已与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或向他们提供证词或情况的人士;(b) 那些运用或运用过联合国主持制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保护程序的人士及一切为此而向上述这种人提供法律协助的人士;(c) 那些根据人权文书确立的程序提交或提交过来文的人士;以及(d) 那些与人权受侵犯者有亲属关系的人士。

2. 委员会请联合国人权机构全体代表及监测人权遵守情况的条约机构继续按其职权采取紧急步骤,帮助防止任何阻碍运用联合国人权程序的行为,帮助防止这类恐吓或报复事件的发生,并在各自提交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或大会的报告中继续述及指称受到恐吓或报复和运用联合国人权程序受到阻碍的事件,同时述及各自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3. 委员会还要求秘书长提请这些代表注意该决议,并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内载从所有有关来源收到的任何有关该决议中提及的那几类人士指称受到报复打击的资料并加以汇编和分析。

一、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3/64号决议收到的资料

4. 根据1993/64号决议收到的资料述及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人受到恐吓,有的运用国内或国际程序受阻或因此而受到打击报复,有的因为反映了侵犯人权的情况而遭打击报复。

5. 遇个人或组织因与人权委员会的某一机构接触而受害时,该有关机构或负责执行委员会有关任务的代表一俟接到请求即采取行动保护他们。大多数情况下,该有关机构紧急致函有关国家政府。这种迅速干预程序在以前根据本项目提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见E/CN.4/1992/25,第14-18段)中已经述及。1993年采取的行动在下一节中述及,其中简述了案例以及收到有关案例来文的政府作出的答复。

6. 根据第1993/64号决议收到的其他有关资料中有一些性质比较笼统的报告,其中回顾了对某几类个人或提出报告的组织的某些成员进行迫害和恐吓的情况,还

而遭惩罚。例如,毛里塔尼亚有23位律师受到政府的骚扰,其中如超额征税,中止与政府机构订立的合同等,原因是这些律师反对豁免几名曾于1989至1992年间参与处决500多名毛里塔尼亚黑人的军官。土耳其有几位与人民法律援助局有联系的律师被拘留审讯。属于土耳其人权协会的律师也成为目标。埃拉泽土耳其人权协会的主席墨廷·詹律师于1993年2月被害。此外,在尼日利亚、喀麦隆、加纳和印度尼西亚,参与人权活动的法学家也曾受到任意拘留。

二、联合国人权机构收到并处理的指称 发生恐吓和报复事件的资料

12. 本章简述人权委员会代表根据1993/64号决议1993年收到的资料和采取的行动。所报告的报复行为从暗示性威胁到法外处决等多种形式。指称受害的人士全部都是个人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那些机构是或曾经是联合国人权机构了解侵犯人权情况的消息来源。特别令人关切而必须指出的是,亲自与人权委员会或联合国其他人权机构代表见过面且事后因而遭到报复的情况有所增加。卢旺达、海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苏丹据报告曾发生过这种情况。

A. 关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特别报告员

13. 1993年,特别报告员继续给有关政府紧急去文,确保那些据报告受威胁或有被处决危险的人士得到切实的保护。在这些问题上,他敦促主管当局进行全面、独立和公正的调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以后再出现侵犯生命权的问题,并要求随时告悉在这方面采取的所有步骤。下文所述的问题是一些人权组织的成员由于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供情况而接到死亡威胁或有遭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危险。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报告员具体提到了1993/64号决议。

14. 必须指出,下文收入的摘要所反映的是有关政府的紧急申诉和答复,仅限于特别报告员最新的报告(E/CN.4/1994/7)所载截至1993年11月22日的资料中收入的申诉和答复内容而已。

阿根廷

15. 1993年8月5日凌晨3点,一些身分不明的人按响埃韦·博纳菲尼(Hebe

将这种恐吓或报复行为的原因与后果放在某一活动领域或国情背景之中进行了分析。这些报告一般都不包含请求保护某个具体人的内容,只是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保护人权卫士的必要性。

7. 美洲人权情况观察会提供了一份墨西哥情况简报,其中特别提到该国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处境。美洲人权情况观察会认为那些人权组织多数能够开展工作而未受多少公开的干涉,不过它们的活动有时还会遇到恐吓行为的阻碍,例如电话窃听、政府内部熟人的“友好警告”、用电话录音机进行威胁、偷盗文件档案等,偶尔还有死亡威胁。

8. 大赦国际发来一些报告,述及针对人权活动积极分子或非政府组织的骚扰或恐吓活动。例如,一份关于柬埔寨情况的报告指出,一些人权团体的成员遭到国家当局的恐吓。哥伦比亚军事情报机关据报告说编了一份约有150位人权工作人员、工会会员和基层领导人的名单,情报机关宣称他们是游击队的同伙或支持者。这份名单如果发表,据说会使他们的人权受到侵犯。此外,哥伦比亚诸如区域人权委员会(区人权委)等人权组织的成员据说曾遭到安全部队成员的威胁骚扰。哥伦比亚被拘失踪人员家属协会的成员1993年11月在波哥大举行的年会期间据报告说曾遭到哥伦比亚陆军情报股(B-2)便衣人员不断的监视、骚扰和恐吓。一份关于缅甸的报告提到军事当局通过监视、恐吓和威胁过去曾经或今后可能会批评军方的任何人阻止大多数人公开表示反对。菲律宾有两位人权活动积极分子,其中一位是大赦国际驻该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于1993年10月11日至12日夜间遭到六个据信是军方特务的人长达数小时的拘留。获释后,他们的家一直受到监视,家属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而躲了起来。此外还收到类似的关于危地马拉、土耳其和卢旺达情况的报告。

9. 安第斯法学家委员会(哥伦比亚科)1993年1月的一份文件也报道了哥伦比亚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成员遭到袭击的情况。该报告具体指出,自1991年年中以来,桑坦德州巴兰卡韦梅哈区人权委已有几名成员被杀。

10.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一份报告称,促进和捍卫人权的活动在危地马拉被认为是反政府行为,因而遭到镇压。人权卫士继续遭到骚扰、恐吓和监视。军队进行法外处决,制造失踪,搜查办公室,捣毁文书,暂时拘留人权组织成员,盘问他们的工作情况。

11.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捍卫法官和律师独立性中心发来一份报告,反映了1992年6月至1993年6月法官和律师遭受骚扰和迫害的情况。这份报告说,以死亡威胁人权律师企图阻遏这种律师履行某些专业职责的事情仍有发生。这种趋向据报告说在北爱尔兰、斯里兰卡、阿根廷和巴西有所抬头。许多国家的律师由于从事人权工作

Bonafini)家的门铃,朝屋里喊道:“你要是不把你的咀闭上,我们就要用子弹来把它闭上。”发生这一威胁事件之前一天晚上,她在电台广播里谴责了据称警方成员几天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杀害五名少年的行为。埃韦·博纳菲尼是非政府组织马约广场母亲协会会长。她已不是第一次接到这种匿名的死亡威胁,因为她公开谴责阿根廷的人权状况。

哥伦比亚

16. 设在巴兰卡韦梅哈的区人权委成员据报由于从事人权工作而受到当地军官的骚扰,接到暗示性的死亡威胁。过去发生类似的威胁之后还会对区人权委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1992年该组织有3名成员遭杀害,看情形似乎是法外处决。

危地马拉

17. 据报告,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一位领导成员 Oswaldo Enríquez Contreras 接到匿名电话说,如果他继续活动,维护农民和“共产党人”就威胁要杀死他。据说他父亲 Ricardo Enríquez、兄弟 Roberto Enríquez 博士和弟媳妇 Maria Elena Enríquez 也接到了威胁要杀死他们的电话。

18. 1993年9月2日,争取失踪亲属生还互助组(互助组)的办事处据报告发生炸弹爆炸。几小时后,另一个紧挨互助组办事处的人权组织危地马拉被拘失踪人员亲属协会(危亲协)接到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关闭办事处,就要在他们楼里安炸弹。据指称,随后的几个星期还反复接到这种威胁。

19. 1993年9月10日,危地马拉法学家协会办事处据报告发生爆炸,家具和文件严重受损,但未伤及任何人。同一天,据说有两名武装人员来到 Mario Antonio Díaz 国内流离失所人员第一安置所,要求和危地马拉流离失所者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说话。据报告,几分钟后他们朝天开了大约14枪,企图以此恫吓住在安置所里的家庭和全国委员会的成员。

20. 据报告,1993年9月11日和14日有武装人员在争取失踪亲属生还互助组主席、著名人权活动家 Nineth Montenegro 家门外开枪。据说首都各处墙上刷的标语指责她是“叛徒”。

21. 1993年10月5日,自称“罗伯托·洛伦萨纳反共运动”的组织据报告从各人权协会门下偷偷塞进去一张传单,威胁要杀23个人,其中许多人以从事人权活动著

称。这张名单上有：Rosalina Tuyuc, Rosario Pu Gómez, Nineth Montenegro, Byron Morales 和 Otto Peralta。这张传单还指控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Rigoberto Menchú 与危地马拉民族解放部队有联系。

卢旺达

22. 促进统一和社会正义协会常任书记 Ignace Ruhatana 于1993年5月3日至4日夜间遭武装人员袭击受伤。这次袭击据报告与他从事人权活动有关,尤其是因为他为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据认为是卢旺达治安部队所为)提供文件资料。关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特别报告员1993年4月到卢旺达出差期间,他曾亲自向特别报告员提供证词和文件。

土耳其

23. 据报告,人权律师兼人权协会迪亚巴克尔分会会长 Fewzi Veznedaroglu 接到若干次要杀害他的威胁,其中至少有几次据指称是土耳其治安部队成员发出的。1992年12月25日,两名便衣警察据报在人权协会楼前告诉 Veznedaroglu 先生说:“如果你不停止那种活动,你就会跟别人一样下场”,据指称这里指的是人权协会前任会长 Vedat Aydin 1991年被害事件。据报告,12月30日 Veznedaroglu 先生在协会办事处接到几个内容类似的匿名电话,这些威胁据称与他为政治犯辩护、为土耳其西南部侵犯人权案提供文件资料有关。

24. 关于这个问题,土耳其政府答复说, Fevzi Veznedaroglu 并未对指称威胁他的警察向迪亚巴克尔检察署或省长提出控告。但是,一名被拘留的库尔德工人党党员说,库尔德工人党计划用某种方式暗杀 Fevzi Veznedaroglu 等人士,使人觉得是治安部队干的。治安部队立即告知另外两位人士提高警惕,而 Veznedaroglu 先生在国外,还无法找到他,但是已通过一位同事通知他回国后与安全局联系。

25. 特别报告员在随后致土耳其政府的信中转达了另外又收到的关于 Fevzi Veznearoglu 案的资料。据指称,说库尔德工人党计划暗杀他的那个被拘人员是被治安部队逼迫才这么说的。

26. 律师兼埃拉泽人权协会会长 Metin Can 据报于1993年2月21日接到某个自称警察的人打来的电话,说他的一名顾客遇到车祸,让他立即去警察局。Can 先生

与医学博士 Hassan Kaya 医生联系,两人一起坐 Can 先生的车前往警察局,此后再未见他们生还。2月22日,Can 先生的妻子 Fatma Can 据报告接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说:“我们把 Metin 和 Hassan 杀了。谨表哀悼”。Can 先生的汽车在同一天找到。据报告,其他家属也接到了令人不安的电话。

27. 关于该案,土耳其政府答复说,两人发现都死在通杰利附近的一座桥下。通杰利主管部门已开始调查。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关的文件只能由被告辩护方查阅。

28. Fatma Can 夫人接到了与她丈夫被害有关的死亡威胁。据说她是见到并有可能识别那两个绑架她丈夫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有可能识别那两个假定的绑架者的人据报已逃离该国。

29. 特别报告员在随后致土耳其政府的信中转达了另外又收到的关于 Matin Can 和 Hassan Kaya 案的资料。资料指出,从1993年2月21日两人失踪至1993年2月27日发现两人的尸体,当局始终未采取行动查找他们的下落。资料指称,两人被杀可能与“反游击部队”和治安部队有关。

30. 1993年3月12日,里斯(Lice)人权协会的代表 Hafiz Uzun 据报告在带一个德国参观团去一所据说已被治安部队纵火点着的房子的路上被捕。据指称,他随后被拘禁在里斯宪兵司令部,期间,一名上尉曾威胁要杀死他和他的家属。6月9日第一次审讯后有条件地释放了他。据指称,他在被拘禁期间曾受酷刑。1993年6月23日深夜,特工队队员和士兵据报告抄了他的家,并当着他妻子和儿子的面威胁要杀死他。6月23日早晨,特工队队员和士兵在街上再次将他围住,据报告他们再次威胁说,除非他离开这座城市,否则就要杀掉他。

31. 土耳其政府答复说,Hafiz Uzun 确曾被捕并由国家安全法院对其审讯,法院解除了他协助、窝藏恐怖分子的罪名。他被拘押在迪亚巴克尔监狱时曾提出控告,称里斯县宪兵队的指挥官曾威胁要杀他。对这些指称已开始进行调查。Hafiz Uzun 并未提出任何其他控告。

B.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32. 工作组收到洪都拉斯人权委员会关于政府人员骚扰、恐吓委员会主席和司库的资料,其原因据报告是由于他们谴责了该国犯罪者逍遥法外的局面,要求建立一支进行刑事侦查的技术性警察部队。工作组通过“迅速干预程序”提请洪都拉斯政府注意这一案件(见E/CN.4/1994/26,第235段)。

C. 注视危地马拉人权状况的独立专家

33. 独立专家在他分析危地马拉人权状况的报告中述及几个侵犯人权组织成员人权的事例(见E/CN.4/1994/10)。其中有:争取失踪家属生还互助组的成员 Francisco Guarcas Cipriano 于1993年10月19日在危地马拉城被四名串通陆军的人和前市民自卫巡逻队员绑架后失踪;1993年10月27日,危地马拉流离失所者全国委员会委员 Marco Choco Damas 被拘留。独立专家在报告中还反映说,一份署名“Roberto Lorenzana 反共运动”的传单威胁要杀害几名人权活动积极分子;有人对危地马拉社会科学促进协会办事处及人权调查研究促进中心领导成员 Factor Méndez Doninelli 发出威胁。独立专家的报告还提到民族社区“我们一律平等”委员会和农民团结委员会成员 Tomás Lares Cipriano 于1993年4月30日被害事件, Cipriano 此前曾几次接到要杀害他的威胁。对 Tomás Lares Cipriano 曾下过予以警察保护的命令,但没有执行。

D. 海地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34. 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说,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在海地建立的监测海地民主和人权状况的国际民间代表团的成员以及与其有联系的人士遇到恐吓和挑衅(见E/CN.4/1994/55)。据报告, Illia Davilma 太太由于向国际民间代表团的成员提供了该国压制人权的情况而于1993年5月9日在太子港太阳城被军方成员即决处决。此外,根据国际民间代表团向大会提交的报告(A/48/532/Add.1第14段),代表团自1993年10月15日和16日撤出海地后陆续收到报告说,代表团的当地雇员和与代表有过联系的人一直受到威胁。

E. 注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特别代表

35. 特别代表第三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曾会晤拘禁在德黑兰埃文监狱的两名巴哈派教徒 Bihnam Mithaqi 和 Kayvan Khalajabadi。1993年12月30日,特别代表向伊朗政府致函紧急呼吁,因为他早先已获悉,对那两人的死刑判决于1993年11月23日再度确定维持原判。据报第81号判决书的D段指控他们向联合国递送情报,这很可能指的是特别报告员上次访问期间与他们会晤一事(见E/CN.4/1994/50)。

F. 苏丹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36. 特别报告员收到可靠的资料说,在他1993年9月访问苏丹期间,一些设法与联合国办事处联系或确曾会晤特别报告员谈及与其任务有关事项的人,遭到警方和治安部队的盘问和逮捕(见E/CN.4/1994/48)。

37. 1993年9月12日, Aliaba James Surur 神父曾与特别报告员会晤。据他说,次日早晨7点他在家被人接走,带到喀土穆的治安司令部,在那里被拘留了五个小时。他称有人对他说:“小心点,特别报告员现在是还在这里,可是他两星期以后要走的,而你还要在这里呆着的。”

38. 1993年9月19日,苏丹南部流离失所学生团体的两名代表向驻在喀土穆的联合国官员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抗议关闭他们的学校。其中一位代表 John Lookwer 据报告在走出联合国驻地后被捕。次日,一群学生在联合国院里聚会,两名代表向联合国官员报告了 Lokwer 被捕一事。在这次和平示威的现场有一些穿制服的武装警察和治安人员。进去报告的两名学生由一名穿制服的警官和一名治安部队的军官陪着。警官和军官离开联合国驻地时表示要释放 John Lokwer。据报告,几分钟后,一些学生在联合国办事处门前遭围捕。后来,当局宣布这些学生已获释。但是,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还未收到任何资料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39. 1993年9月23日下午1时30分,四名妇女刚向特别报告员递交材料后即在喀土穆联合国办事处门前遭警察逮捕。特别报告员亲眼目睹两名妇女在街上被强行拖进一辆警车。几分钟后,警察当着许多人逮捕了大约25人,这群人主要是妇女,他们在联合国办事处门前等候会见特别报告员。据报告,有几个人遭到警官的殴打。尽管政府当局据说一再保证不干涉请愿者的和平集会,但还是抓了人。这些人最后是被释放了,但是,有些妇女在治安官员盘问她们时受到威胁、侮辱和谩骂。

40. 1993年9月,特别报告员前往苏丹出差期间,曾向司法部长提出上述事件中若干起。司法部长表示一定要调查。1993年11月24日,这位部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提到1993年9月23日的事件,他说那四名妇女及其他有关人员被捕是因为他们会见特别报告员时正在非法“游行”,违反了治安法。但是,他说所有的人都安然获释。苏丹政府在评论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的中期报告(A/48/601)时还指出,参加集会的人事先没有按规定获得许可。此外,政府有责任保护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办事处免遭暴力袭击(A/C.3/17,第B16段)。

41. 关于这些事件,特别报告员表示强烈的关切说,在他出差调查期间,那些曾与联合国办事处接触以及前来与他晤谈的人遭到了打击报复。他说,这种关切担忧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上所述,Aliaba James Surur 显然受到了威胁。即使考虑到所援引的那些法律的有效性,这些事件的实际作用还是干预了他的调查工作。

XX XX XX XX XX